

二、府州志序、跋、凡例选

(一)府州志序跋

元至正三年(1343年)《成都志·序》

成都居全蜀上游,其名成自西汉时,按《禹贡》蜀为梁州之分,岷山导江,东别为沱,今导江与沱名县镇于成都,此三代以上地志之见书而不可诬者。文王之化,行乎江汉之域,江有沱,詠于二南之先。然汉统于江以朝宗,沱附于江以起兴;江首四渎,历代祠其种于成都,故成都为江之源,而荆扬之江,特其委尔。考禹迹声教之所被,稽文王美化之所行,征诸武王“逖矣西土”之誓言,论全蜀而溯源于成都上游之导江,则孰有逾于《诗》《书》之为可信而有据哉!谓三代而下,秦惠伐蜀而后得与中国通,文翁兴学于成

都而后得与齐鲁比,不端本于夫子删定之经,惟迁《史》之言是信,亦学者之过也。若曰周衰而诸侯畔,蜀据阻自安,职贡废而文教弛,秦惠伐之而后道路通,文翁兴学而后风化复,斯可也。舍《诗》《书》断自秦汉即论蜀,则未可也。全蜀郡志,无虑数十,惟成都有《志》,有《文类》,兵余板毁莫存,蜀宪官佐搜访百至,得一二写本,迺参稽订正,谨就篇帙,凡郡邑沿革,与夫人物风俗,亦概可考焉。遂鸠工锲梓,以广其传,若《文类》之详,则有待于后之好事者。

至正三年(1343年)二月,费著序

元至正三年(1343)《成都志》,费著纂,书佚序存。

费著(生卒年不详),进士,华阳人。除国子助教历官至汉中廉访使,调重庆府学官,明玉珍攻城,遁至犍为而卒。有《岁华纪丽谱》、《氏族谱》等传世。

明正德八年(1513年)《夔州府志·序》

夔介雍及荆,古梁州之东徼,自岷峨而下,山川流峙,若堂奥然。夔其门与,而峡之门又隘而高者。峡口有堆曰滟滪。孤根峭骨,独抗崩涛于终古。而诸石牙撑角觚者奴耳。左右二山曰白盐、赤甲、硃矶倚天而售奇献巧。如十二峰者,其儿孙乎?此岂徒哉!乃刚柔之变,结而为干城。以闕夫参井之灵孕,府治实临,是徼亦雄矣。府下有县曰奉节、曰巫山、曰云阳、曰万、曰达,以至于建始,名凡十二,纵横无虑千里。其间沿革显晦,地势,人物丕绩,异行,风俗,食货,与夫古今文字,未之或无,不志,其谁以传?

高皇帝洪武辛酉(14年,1381),改州为府,到今无方策可考。阙事孰大焉。正德己巳(4年,1509),上即位之四年也,临川吴君显之,起进士冬官郎

中,出领夔牧。视纂余,概厥心已。顾贼病两川,戎马骚屑弗暇,越壬申(7年,1512),林见素公,歼贼殆尽,而民汔小康,君乃移札十二县,俾咨访所当书者以呈,既及之,遂聘文士汇次成志,将锓梓,属予序焉。呜呼!夔其有光也夫。先是过夔者,或问志有无?曰无。殆藐夔为陋邦矣。继今阅是志而知吴君此举,众弛毕张,云布星列,外焯而中动,应敛襟而曰:有是哉!夔也可忽诸。况说形胜交会,神摩气荡,而伟人迭出焉。其志固不止此。人称吴君兴学慎罚,节材重彝典而膏泽乎民者良厚,斯足征矣。呜呼!夔其有光也夫!故序。

正德八年(1513)癸酉秋七月望日,翰林院检讨,征仕郎国史馆充经筵官内江刘瑞序。

明正德《夔州府志》12卷首1卷。吴潜修,傅汝舟等纂。明正德八年(1513)刻本。

吴潜(生卒年不详),字显之。江西临川县人。弘治三年(1490)三甲第二十七名进士。明正德四年(1509)任夔州府知府。修《夔州府志》。

傅汝舟(生卒年不详),字济川,湖南清浪卫(今贵州正屏县内)举人。明正德七年(1512)任夔州府通判,纂《夔州府志》12卷首1卷。

明万历三十年(1602年)《汉州志·序》

志之义何昉乎?郡之有志,犹国之有史。《鲁史》《春秋》,夫子修之者也。尝曰:“述而不作,信而好古”,又曰:“多闻择善而从,多见而识”。即是而遐思,其用心靡不严斧衮于既往,重劝戒于将来。然则广汉弗志,惧无纪录备观省,总志固可少欤!

按:汉之为郡,其来奚只千百余年。輿图枕夷夏之交,川岳萃西南之美。风俗朴茂,物产殷繁,户口增多,人文彪炳。政治之沿革兴废,往迹之绝续存亡,凡有关传述者卓哉!张君已命笔于嘉靖中,顷者,太烦则议裁,太缺则议补,予有志焉,而未暇也,乃属其事于黄博士。博士,郡中多闻人也。亦既厘而正之,二三弟子员又相与襄而校之。撮其梗概,分为八卷,命之曰:《重修广汉志》。

(志)岂以侈观哉,盖所深致意者有在焉。唐虞比屋可封,岂其人皆瑰异?三代六德六艺,沦肌浹髓,岂其人尽琦行?道德一,风俗同,即樵夫牧

竖,未有不循矩矱者,况汉多士君子乎?士君子用,则尚材猷,论勋业,至其褻躬缮性,则道术人心为重也。彼孝弟忠信,礼义廉耻,孰非人心之固有?矧览篇中芳规,向往而亟慕之,将见触之即起,为之即是,孝不取必于刳股,忠不取必于剖心,节不取必于投崖,廉不取必于蚯蚓,庸行乃诚懿行也。允若是,不唯司风教者嘉与四境维新,虽汉之丘岳汪流,行且增高增深,古所称沃野千里者,洵天府之国哉!倘非见贤思齐,主善为师,沾沾焉探异索奇,冀宠荣以华载籍,将循名鲜实,去唐虞三代醇风远矣,何以一道术同人心耶?昔人谓《春秋》为传心之典,余于是编也,不敢诬今古人有异心,是以愿兹土待治与才等之莅治者,务各俯焉鉴古以涉其心欤?

时万历三十年,岁次壬寅(公元1602年),夏四月之吉,奉直大夫,知汉州事,关中王大才谨识。

王大才(生卒年不详),静宁州(今甘肃省静宁县)人,选贡。张一廉,汉州人,嘉靖举人。曾修《汉州志》,己酉科举人。郡人庆符县儒学训导黄鸣阳有《序略》。

明万历三十年(1602年)《汉州志·跋》

《汉志》相传非一日矣，旧本蒙茸，安保观之弗酱瓿乎？正堂王君有隐忧焉，以其公余著述纂修，取《志》而新之，业已叙诸篇首矣。

予不敏，甫入境内，乐观盛典，循故事以跋其后。乃作而言曰：“美哉！汉之水土乎！弥漫无际，千里一视，水土之所钟毓，多奇伟之士。第往昔懿行，赖志以垂久远，而方来法戒，又将藉志以为龟鉴也。”然则王君之修《志》，欲令观者有自，余因此而识其成美之公心焉。虽然，亦在观之者何如耳。

昔周公之作《周礼》，盖因唐虞夏商之制，计异日之衰，而预之防者也。乃议者曰：“秦不用礼而亡，汉不必《周礼》而兴。至于我国家圣神之极，卒有

《周礼》左卷。”议者曰：“不为周公，乃所以为周公乎？”观之异则议之殊，谓志不系于人之观之，吾不信也。

广汉自有人文以来，秉笔于志者，谅非一手，惟兹乃称实录。倘或按谱而求其肖，一一而躐其踪，则其弊也不免学步之消。千金享敝帚，斯亦不善观志者矣，何异执周以议秦汉，又执秦汉以议今世哉！或曰：“审如子言《汉志》筌蹄耳，奚刻焉？”曰：“以融通之心观之，则何书而不筌蹄也？以执滞之心观之，则何书而筌蹄也？以是知善于观乃所以善于法戒欤？余并以知王君成美之公心，而汉之称美者，非仅在山水之间已也。

万历三十年(1602)汉州州佐徐周烈跋。

明天启元年(1621年)《成都府志·序》

戊午之祀，不佞自陇移蜀，至则《通书》告成，已盛传矣。次第涉猎，见其纲领具举，伦次得宜，如纪大宗，然序昭序穆，而不详昭穆之玄支也。如纪江汉，然为沱为潜，而不详沱潜之条派也。非不能详，不及详也。是史传之体要也。若乃《成都郡志》，直如四

体之有筋骸，然不可不问其详矣。今分类若干目，合帙若干卷，灿然大备。其山川、建置、城阁、祠宇、科目、总之不离省志者十九。至于犹是疆域也，省以总延袤，而此则州邑有编户之相错，徼外有番部之震邻，内顺外严，不可不详也。犹是赋役也，省以总征输，

而此则户口几十四万,税粮几四十万,比于诸郡,不翅倍之,民力民脂,不可不详也。犹是水之力,而或勤流凿,或费堤防。犹是盐之力,而开产者十一,待哺者十九,利兴害伏,不可不详也。凡此重申画之条,切畏怀之虑,杜侵渔之衅,昭功令之垂,必不得与民变更者也。至于以名宦列传者,省志三百,郡益以二百有奇。各怀其政教之泽,而共考诸断碣之遗,不如是,无以别仁暴也。以忠节列传者,孝义列传者,贞烈列传者,省以类聚,郡则并而列之,省以旧述,郡则博而传之,不如是,无以修人纪也。以人物列传者,郡益省而三之,以隐逸列传者,郡益省而倍之。尚论者取以传信,好德者举尔所知,不如是,无以大劝戒也。此不得不与时污隆者也。若乃艺文,诏世诸体灿焉,众美绚焉。特于省志一一标录,非成

都之豪杰,即其纪言事于成都者也。是书也,罗材于文学,采议于物情,而折衷之于郡伯,良工洵苦心矣。

余考记载,常璩作《华阳(国)志》,自先汉至晋初四百岁,而士女可书者得四百人。后自晋初至周显德凡七百岁,而寥寥无称。其他湮没,亦复称是。岂前后文献,顿尔悬殊,祇无作者,遂成旦昼!有志之士,安得不熙不失乐生之心,殆为第一义。善乎,罗琛之言曰:“床上有百钱布被,甑中有数升麦饭。苏张巧说于前,韩白按剑于后,将不能一夫为盗,况贪乱乎!”今之郡守,即古之节度安抚,以水鑑者一面,以人鑑者千古。得是编而存之,前车具在,劝戒炯如,殆守作志之深心哉!余不佞,特为表而出之。

四川布政司,左布政使,山阴朱燮元书。

明天启《成都府志》58卷,冯任修,张世雍等纂。

冯任(1566~1638),字懋和,浙江慈溪县人。万历三十五年(1607)三甲第二十四名进士,万历四十五年(1617)任成都府知府。

张世雍(生卒年不详),四川潼川州(治今三台县人),万历间廪生。

四川布政使朱燮元、四川监察御史薛敷政、四川按察司副使戴燦等为之题序。

朱燮元(1566—1638),字懋和,浙江山阴(今浙江绍兴市)人。万历二十年(1592)三甲第七十一名进士。以平蜀黔乱而加少保进少师。《明史》卷249有传。

清康熙二十五年(1686年)《顺庆府志·序》

郡邑之有志,犹国家之有史。所有由即迹见远,以适于治之书也。其间,积邑而郡,集郡而省,集省以大一统。揆国是,则国不泥于荒服,犹之省不暗于郡邑,郡邑能周识乎所隶,于以通险易,酌时宜,一风尚,颂神明焉,志之时义大矣哉!

安汉,距会城西北陲,秦火而后,典籍散遗,志乘剥落,只字莫睹者,历有年所。惟是山川之灵异,节义之精英,典制人文之光耀,绩而复蚀,蚀而复绩者,岂非间气之磅礴,不容终晦哉!

迩者,纶音特下,诏令天下各直省,例以志进。所谓“能迩柔远”,求治无已之盛心,其未艾也。凡兹臣工,抚有疆域,詎敢冒昧以图?顾余自奉命,来典兹郡,莅事伊始,百凡未谙,夙夜冰兢,乃于案牍间,捧读征书之檄,见上宪仰体朝廷,高瞩旷览,坐致到(郅)隆,指掌可谳之至意也。矧兹弹丸,版籍维新,洞若观火,条分缕晰,如理家

焉,安上金下,如置物焉,又何虑乎碍目棘手,不足仰报高深于万一乎?无如诸属,当灰烬之余,壁藏久废,献老无稽,呼疾应迟。久之披烟拨草,广搜远缉,所幸古洞残碑,缙绅秀士,存什一于千百,次第编修,各竣乃职。虽稗野史,因陋就简。然山川之灵异,节义之精英,典制人文之光耀,如江河之两地,日月之经天。而余得以约略其间,险易以通,王制以定,官箴以立,礼义以兴,教化以起,风尚以一。凡所谓因革损益,酌古宜今,权衡尽变者,不觉油油然其欲出。

爰集郡绅士,汇而成帙,借手上宪,以覲天子。曷以史笔从事,宁核毋纵,宁实毋华。务期有裨于国,以适于治,是为朝家(廷)命志之意。若乃图绘山灵,辉张藻翰,黼黻太平,南辕北辙,其于斯役也,不大相径庭矣哉!于是乎序。

时康熙丙寅嘉平月,中宪大夫,知顺庆府事,阆山李成林茂远氏撰。

清康熙《顺庆府志》10卷,李成林修,罗承顺等纂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刻本。

李成林(生卒年不详),字茂远,辽东广宁县(今北镇县)人,监生。康熙二十五年(1686)任顺庆府知府。

罗承顺(生卒年不详),南充县人,康熙八年(1669)举人。

清康熙三十三年(1694年)《邛州志·后跋》

从来名山大川,类多伟人生于其间。然不得好学深思,博物洽闻之哲,考古证今,成一家言,则百世下慕山川之胜者,亦是能不出户庭,如身履其地,亲炙其人哉!此人以地传者,又必以地传也。而独不可语于临邛,临邛山川甲于巴蜀,胡安、了翁,接踵称道学焉。王吉、燕肃,政美于前,张瑞庵、萧君常继美于后,是宜有所托焉,以传不朽。兵燹之后,继以啼号,故简遗迹,既不复存,学士大夫避乱谋生之不暇,又不复纪载,欲编成书,以俟后之君子,有所稽考,可不谓难。我郡伯戚公,任事兹土,心窃悯之,爰搜断简,博访遗贤,寒暑两阅而志成。甲戌之冬,绅受事蒲邑,趋署请谒,公示以志,绅

仅复披阅,见其山川形势之必详;政教风俗之必悉;贡赋、物产、理乱、灾祥之必备;忠孝、节义之必书。循吏良法之必纪。举一郡之远迩今昔,方开卷而了若指掌。自兹以往,人以地传者,复以人传矣。

夫牧民此众矣,处胜地则苦于烦,任凋敝则拙于力,何志之能为?公向治睦陵,纂成县志,读者称快,会治邛郡而志复成于荒芜无稽之中,人所难能,独克胜任,苟非积学之深,讵能有此?今天下大一统,筹修广舆,执此以献,绅固知其大有裨于同文之治也。谨跋。

蒲江县知事李绅文。

清康熙《邛州志》13卷,戚延裔修,王前驱等纂,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刻本。

戚延裔(生卒年不详),山东黄县人,附监生,康熙三十年(1691)任邛州知州。

王前驱(生卒年不详),邛州(今四川邛崃市)人,康熙二十六年(1687)举人,曾任江西万安县知县等。

李绅文(生卒年不详),安徽颍州(今阜阳)人。康熙二十七年(1688)三甲第九名进士。康熙三十三年(1694)任蒲江知县。为《邛州志》题《跋》。

清乾隆三十九年(1774年)《酉阳州志·跋》

先生(指邵陆)之《志》酉阳,盖悯

其文献无征而作,犹之乎志《庄浪(志

略)》也。

初,先生之志《庄浪(志略)》也,先后十年,循声懋著,著《官箴》(廉宪欧阳兰畦先生增而刻之——原注)、刊《政略》、修《县志》(方伯尹亨山先生序而刻之云——原注),彰彰在人耳目间,其县志一书,于无可考证中,沿源溯流,补前人所未备,既博且精,而先生尚以体裁为病,辛卯(乾隆三十六年,1771)冬,以最陞会理州刺史,癸巳(三十八年,1773)来署酉阳。酉繁难郡也,边连黔楚,土瘠民刁,虽强有力者犹难之。先生年将七十矣,下车伊始,即革积弊,绝苞苴,惩衙蠹,事必躬亲,案无留牍。复考拔全属之秀者教之,且有引而置之署而捐资以贍其家者,殫精惫神,几于日不暇给矣。乃勤政之余,复纂是书,书成属梅校字,梅受而读之,不但钦先生之治行,且佩先生之苦心也。

按《广舆记》载:辰州治西有酉阳城,乃汉县旧址,又载五溪源出武山,均属辰州之泸溪县境,似今之龙潭,非古之酉溪矣。迨考《汉史》及《江陵新志》载九江源委,九曰酉江,酉江者、酉溪也。出会溪西山中,至辰州,东合沅辰,北流会溪,今永顺府地,酉阳正界其西,则龙潭河为酉溪也明甚。且《輿地纪胜》云:“溪州三亭县西北,别有酉阳城,乃刘蜀所置,溪州即会溪,则酉

阳城为今州治也又明甚,特今治距辰州八百里,而黔彭更远,各志遂有以二县为涪陵县地者。按涪陵县今涪州治彭水,古汉葭治。《寰宇记》云:“汉献帝时,刘璋据蜀为汉葭县,厥后昭烈即汉葭置涪陵郡,故《志》曰:“汉葭分涪陵立,则谓郡治即县治者。固非谓郡地为县地者,亦未见其然。是书故以《元和(郡县图)志》为断,盖其时,苗疆初闢,未暇多置郡县,或统而属之酉阳尔。晋宋以还,书缺有间,其后或没于蛮,或据于土豪,沧桑屡变,惟黔彭随没而随复。酉与秀则长为土司地,至国朝始改而归流。噫!僻陋在夷,典章残缺,历观前志所在,或仅纪其略,或两存其说,其无可考证,与庄浪等。谁复能于依稀彷彿中,折衷至当乎!先生独博采广搜,耽思旁讯而草创之,讨论之,修饰之,辨鲁鱼亥豕之谬,阙郭公夏五之疑,虽体裁半仿康对山之《武功(县志)》,武功与《庄浪(县)志(略)》异,而炊沙作饭,苦心则同,故曰:志酉阳犹之乎志庆浪也!然以耄年而治剧郡,尚能游刃有余,肆力于此,尤非任庄浪时可比,岂非天假精神,裨荒僻之区,得以被恩施而存文献哉!至其书题遁而逸,词简而该,拟之杜少陵诗律,晚节渐细,识者自能辨之,梅不复赘。

晋安属吏翁若梅谨跋。

清乾隆《酉阳州志》4卷,邵陆纂修,乾隆三十九年(1774)刻本。

邵陆(生卒年不详),字东行,号元圃,浙江鄞县(今宁波市)人,乾隆十五年(1750)举人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)署酉阳州知州。乾隆三十六年(1771)纂修(甘肃)《庄浪县志略》二十卷。

翁若梅(生卒年不详),福建闽县(今福州市)人,乾隆三十一年(1767)三甲第四名进士,乾隆三十三年(1768)任黔江知县,为《酉阳州志》题写《跋》。

清乾隆五十一年(1786年)《潼川府志·序》

志犹史也。史备天下,志备一隅。虽志与史体异,而以垂劝鉴则同。盖牧长之职。莫先安民,安民之政,在乎富教,使非志,则无以知历代之成宪,非志无以知山川之险易,非志无以知地土之肥瘠,谷种之异宜,非志无以知户口之多寡,官吏之贤否,籍以备稽考而征示献,固守土者之责,亦政治之不容缓也。

予于癸卯秋,来守梓州,询及郡志,得前守刘柱九氏旧编六册,为康熙二十六年所纂辑者,是时兵燹之后,流亡甫集,即欲搜罗,自多挂漏。迄今百年来,向之荒芜不治者,而山头犖确,皆已垦闢,向之流离失所者,即穷乡僻壤,皆已盈聚,其中人文之炳蔚,闾阎之富庶,熙熙皞皞,共享圣朝太平之福,况逢各上宪,仰体九重,发政施仁,子惠元元之德意,无不靖共夙夜,正已率属,益臻风动时雍之上理,为守令

者,宁敢不各励廉隅,共矢清慎,松孙以庸陋之才,谬膺表率,莅任一载,差幸物阜时和,刑清政简,因思梓郡自雍正十二年,升州为府,添设附郭三台一县,又五十年,均无志乘可考,即索览属邑之志,近者三四十年,远者更六七十,皆久未修辑,尤多阙略,若及今不修,恐日月寝久,将并此湮没于蜗涎蟬腹之余,予滋惧焉。

爰偕宾从僚属,共相考订,始事于乙巳之春,至秋抄,志甫脱稿,以土地、人民、政事为三纲,分卷十二、分目三十,体裁稍异,纪载颇详,其八邑之志,亦将次第编纂,潼虽一隅,而自汉至今,建置沿革、山川、人物,展卷可稽,了如指掌,是亦守土之责也夫!

时乾隆五十年乙巳小春月,朝议大夫,四川潼川府知府,吴门张松孙书于郡署之紫薇新筑。

清乾隆《潼川府志》12卷首1卷,张松孙写纂修,乾隆五十一年(1786)刻本。

张松孙(生卒年不详),字鹤坪,江苏长洲县(今苏州市)人,监生。乾隆四十

八年(1783)由河南开封府同知升任四川潼川府知府。并督导三台等8县修志,均存。

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重修《重庆府志·序》

昔子朱子莅官,先索其地之《志》观之。明其利弊,察其人情,因以施之政事,盖不徒以儒术为经济也。

壬寅秋,庚奉檄权守重庆,重庆古巴子国,其地东接夔万,北达秦岭,南通黔中,用以屏障西川,地广民殷,每虞覆餗旷官,急资治镜,而江州、南平两图经,既渺不可得,而有明江学士朝宗所撰《重庆郡志》,鼎革之后,亦残蚀不全,心怅然者久之。

夫一郡之内,不悉其道里阨塞几何,何以设险制防?不稽其户口殷耗几何,何以理财用民?不知历来政迹之隆替,人文之盛衰,谣俗之好尚为奚若,又何以兴利除害?劝善惩恶。不敢自逸,亟调各州县旧志报阅,大抵详略异宜,文质殊尚,爰檄合属印官教职,公同采访,编辑成册,陆续申解来郡,复饰荣昌县教谕寇宗,汇纂成志,

总期无滥无遗,以资考核,每成一帙,庚斟酌鉴定一过,即行开雕。万川学博,乃厘为九卷。首舆地,重沿革也。次祠庙,治民者必致力于神也。次食货,生民之大命也。次职官详典守也。于是乎重文事则学校次之,策功勋则武备次之,举贤育才,英俊由之以兴,次选举,志砥行励名,风俗所为丕变,次人物志。终之以艺文,惟仿班志之例,而古迹、诗赋、记、序等类,则散见各条之中,志原以纪事也,附之以祥异,而讫于壬寅,嘉禾丰年,诵扬太平也,观止矣。中间惟我朝职官人物,重令学博再详,采辑既成,叙其梗概,盖资诸寅好之相与表彰云。时大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)癸卯岁,六月庚寅初伏日也。

署重庆府知府,直隶松潘厅同知,金华西躔王梦庚叙。

清道光《重庆府志》9卷,道光二十三年(1843)刻本。王梦庚修,寇宗纂。

王梦庚(生卒年不详),浙江金华县人,嘉庆六年(1801)拔贡。道光十年任重庆府知府。

寇宗(生卒年不详),四川渠县人,嘉庆二十八年(1848)举人,时任成都府学教授。

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《重庆府志·跋》

江文通之言曰：作史莫难于《志》。难乎其言，必皆征实而非可以意为也。顾时或隔数十载，地不越数百里。则其爬搜掇拾，于以彰往而诏来也。虽难，犹未甚。若重庆者，南控黔、滇，东达荆、楚，袤延几二千里，为西蜀一大都会。我国家承平二百有余年矣。其间礼、乐文教之设施，人物习尚之隆替，莅兹土者，抑岂乏瑰阁杰出之才，足以驱遣百家，网罗散佚，成一书以备三巴文献之征，而自有明(成化间)江(朝宗《重庆府志》)志后，迄今三百年，无人焉起而肩之，是果皆一行作吏，此事遂废哉！地广者决择难，不遗则滥，时久者考质难，不舛则诬，信以传信，固不可苟而已也。

清道光《重庆府志》9卷，王梦庚等已见前。

叶朝采(生卒年不详)，浙江钱塘人。道光十五年(1835)二甲第三十六名进士。道光二十二年(1842)署四川巴县知县，为道光《重庆府志》题写《序》。

清咸丰二年(1852年)重修《简州志·序》

尝谓郡邑志乘与史书相表里，龙门(司马迁)扶风(班固)，高轶百代，尚已。後惟欧阳文忠《(新)五代史》，博大精深，差堪继武。下此则得失互见，

西躔太守，为我乡名宿。宦蜀三十年，所至以经术饰吏治。壬寅(道光二十二年，1842)秋，来守是郡，慨然念斯志之不可久缺，而又不敢以其所难者埃之人，于是博加采访，以荣昌教谕寇君司纂辑，而亲总其成。事虽因而实创，昕夕编摩，如列眉、如观火。朝采于是年冬，奉檄权巴篆，受而读之，辄叹其简练精覆，突过康对山《武功(县)志》以上。开雕甫半而公遽归道山。朝采窃惜是书之垂成而成之，如此其难也。固督促之以毕公之志。呜呼！公往矣。公固自有其所以不亡者在哉！

赐进士出身，署重庆府巴县事，罗江县知县钱塘叶朝采谨跋。

不无遗议，史才诚难其人也！然如杜佑之《通典》、元和之《(元和)郡(县)国(图)志》，暨康对山之《武功(县)志》，不事依傍，自成一家言，虽未足上追班

马,亦庶几作者之权舆乎!

余阳安承乏,六载于兹,窃见其士则秀而文,其民则愿而朴,其比闾族党之间,则嫻睦任恤,相友相助,共敦古处,犹有先民遗风,未尝不叹国家深仁厚泽,涵养休息,俾斯人共享升平之福者,至深且远也。广哉熙熙,各得其所。

爰取旧志阅之,而残缺失次,遗漏实多,考是志成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),岁在癸丑,迄今世历五纪,过此弗修,则上下数十年间,风俗之盛衰,时事之变迁,书缺有间,谓非守土者之咎欤?

夫简固益州之一大都会也,上接天府,下达巴渝,数郡毗连,山川相望,非务为炳烺者,可以率尔操觚也。庚戌(1850)春,州孝廉陈君星楣,率诸生以重修请。爰设局于凤山书院。嗣陈

君以足疾苦归,黄君芄山总之。惟时秉笔削者有人,司采访者有人,搜断碑残碣于荒烟蔓草,觅名流芳躅于山颠水涯。凡前志之误者正之,阙者补之,其新增之数,不啻十之六七,至其分门别户,以类相从,井井有条,犁过不混,诸君之从事于斯,其用心亦良勤矣。

今岁仲夏,书告成,退食之余,细为校阅,纲举目张,无美不具。异时采风者,欲知斯郡之典实,将于是乎在,而不致慨于文献之无征也,顾不懿欤!董事诸君,不予鄙弃,而来问序于余,余深幸诸君之有志竟成也,遂不辞而为之序。

咸丰二年(1852),岁在壬子,蕤宾月(五月)望日(十五),赐进士出身,诰授奉直大夫,知四川成都都府简州事,高平濮瑗琅圃氏,序于阳安(简阳)宦署之拥翠轩。

咸丰重修《简州志》14卷,濮瑗修,陈治安、黄朴纂。咸丰三年(1853)刻本。

濮瑗(生卒年不详),字琅圃,江苏溧水县人。道光六年(1826)二甲第九十六名进士。历署犍为、峨边、成都、彭县、江津、安岳、温江等县知县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任简州知州。

陈治安(生卒年不详),字星楣,简州人,道光十二年(1832)举人。凤山书院山长。

黄朴(生卒年不详),字芄山,简州人。道光十九(1839)举人。凤山书院山长。

清同治二年(1863年)重修《酉阳直隶州总志·序》

史家有三长,而才与学居其二。修志者,何独不然。无他,志中之事,虽属陈迹,要在勤于采访,精于摭拾,一归大手笔之修讨,而显微阐幽,厥功甚伟。酉阳山川之盛,旧称才藪。自我朝涵濡二百余年,风气恬和,人文蔚起,于兹尤盛。

癸亥(同治二年,1863)秋,余权斯篆,尚未暇征文考献,时,壶川冯君,右之冉君,以修志告成,就正于余,余曰:“此前任王公雅惠所留,抑亦诸君子才力学力所共成,余何用赘者为?且发

匪犯境,防剿维严,迩来军务稍平,而簿书鞅掌,辄无虚日,诸君子效董狐之遗风,工子产之润色,忠孝节义,有美必彰,经济文章,相资为用,自不同一家者言,独怀私见已也。今而后,付诸枣梨,俾世之读史乘者,得所据以考其见闻,官斯土者,有所凭以敷其政治,词则简括,事则辉光,藉以培风俗而励人心,是则予之厚望也夫!

同治二年(1863)仲冬月中浣之中。赐进士出身,署酉阳直隶州事,黔阳金筑张秉堃谨撰。

同治增修《酉阳直隶州总志》22卷,首1卷,末1卷。

王鳞飞等修,冯世瀛、冉崇文等纂,同治二年(1863)刻本

王鳞飞(生卒年不详),字个山,浙江省奉化县人,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举人。历署四川省峨眉县、彭山县知县。咸丰十一年(1861)以军功加知府衔,署酉阳州知州。

冯世瀛(生卒年不详),字壶川。酉阳州人,道光十一年(1831)举人,官四川金堂县训导。

冉崇文(生卒年不详),酉阳州人,廪生。

张秉堃(生卒年不详),字子敏,贵州贵筑县人。道光二十五年(1845)二甲第三十七名进士。同治二年(1863)署酉阳州知州。

清同治二年(1863年)续修《嘉定府志·序》

修志之弊,约有五端。有就前人之书,略为增减,遂谓远迈前人,其实

狙公之三四耳。其弊一也。有攘窃前人,遂为已有,如郭象之于向秀。其弊二也。有矜奇立异,炫已之长,诋毁前人。其弊三也。有可疑之处,或偏袒一说,或任意删削,昧圣人阙如之意。其弊四也。又其甚者,掠美市恩,瞻徇情面,于职官则滥称名宦,于人物则谬赞贤良。弄月吟风之句,辄入艺文;索隐行怪之谈,诧为仙释。其弊五也。除兹五弊,而欲率尔操觚,戛戛乎难哉!

嘉定旧无志,昌明之图经早亡,张玉甲所编,半多脱落。如张开之《峨眉志》,袁子让之《二山志》,邓嘉猷之《备边志》,邵博之《闻见录》,陈惟直之《圭刀录》,沈立之《海棠谱》,或纪山川,或纪政事,或纪物类,亦不得谓之总志。惟奉新宋公梅生典郡时,创修府志,博览群书,广为搜罗,为类有九,为卷四十有八,为言三十五万有奇,洋洋乎大观也。第历年久远,版已朽蠹,不能不

重刊;既重刊矣,而此数十年中之职官、选举,忠臣、孝子,名儒、硕彦,烈女、贞妇,有关于人心风俗者,可竟听其湮没乎?爰不揣固陋,举而增之,一切体制,悉照原志;凡新增者,附录于各门之后,正所以藏已之拙,而求免于五弊也。

是役也,兴于咸丰九年四月,守郡者长白文公冶庵,嗣因滇匪之乱,暂行停止。其接署嘉郡者,为史叙平观察,所有武功,则史公之力居多。余于十一年冬,来守斯郡,时仍未清贼氛,四郊多垒,越同治建元九月,李逆授首,境内肃清,乃得与都人士旁搜博采,比甲成书,付诸梓人,同资考镜。倘有疏漏,尚望后之君子,随时补缀,以匡余之不逮焉。

同治二年,岁次癸亥,嘉平既望,赐进士出身,诰授朝议大夫,四川嘉定府知府,前吏部稽勋司主事,粤西古白州朱庆镛撰。

清同治续修《嘉定府志》48卷首1卷,文良、朱庆镛等修,陈尧采等纂,同治三年(1864)刻本。

文良(生卒年不详),字冶庵,吉林长白县人,咸丰六年(1856)任嘉定府知府。后升任四川盐茶使。

朱庆镛(生卒年不详),字晓霞,广西博白县人,由遂宁知县升任嘉定府知府。

(二)府、州志凡例

清道光二十三年(1843年)《重庆府志·凡例》

古人著述,凡例即随事载之书中,《左传》言凡者,皆凡例也。

明初府、州、县志书成,必推其乡先生之齿德俱尊者叙之,否则官于其府、州、县者也。皆必文优而又有功是书者为之。义取于独断,则有自为之而不让于乡先生与官者者矣,皆所谓职也。叙止一篇,或别有发明,则为后叙。亦有但记岁月而无叙者,两叙非体也。不当其人非职也。顾炎武云。

自古书籍文字,头行题目,无不顶格写者,后世欲便区别,乃低二格,非古也。

凡一郡一邑之志,先正封域,稽道里、考山川、详关塞、而凡《食货》、《职官》、《学校》、《武备》,以及古今政治之得失。风土嗜好之奢俭,人物、典章之兴起,莫不以次详焉。尚古远而略近今,采谣俗而失事实,非善于志者也。

《建置沿革》,必有表有说,至旧志《古迹》名存实亡者,亦一一分注之。惟僭伪如王莽篡汉,契丹入汴,其妄有改易之处,毋庸编入。

王者体国经野,爰有城邑,城邑定而公署列焉。所贵在正方位以辨疆

界,详四至八到以知广袤,论形势险易以察要害,若《三都(赋)》、《西京(赋)》,夸多斗靡,虽别有讽劝,义无取焉。

禹平水土,主名山川,《职方》辨州,惟表山藪川浸,是固财用之所出也,畜产之所宜也,尤当详列古今战守攻取之宜,而兴亡成败之得失可鉴,其景物之盛,以及游观诗赋,非有关于政教学问者,汰而不录。

山川布而相其阴阳,则有市镇。据其形胜。则有关梁阻阨,凡以守国也。至于先民宅墓,世家氏族,以及贞淫风俗,凡有系于风化观感者,必搜访而详著之。

国家礼明乐备,于黉官及文、武两庙,极其尊崇。其余载在祀典者,守土官,莫不春秋有事焉。固当备列,以重一代之典章,惟其仪文度数,详见《大清会典》《礼部则例》二书,是通典也,不得摭入,以为一郡一邑之志。若夫乡曲寺观古刹,例可附见,淫祠不必滥登。

《食货》,生民之大命也。我朝轸念元元,丁粮科则,时有减除。故凡

《田赋》、《户口》、《徭役》、《杂税》、《积贮》，自当遵新定则例编载。《蠲赈》、《荒政》，凡以惠民，亦当留心考核，以资治理。物产以同者，不具书，不必书也。

《职官志》，文、武分别叙录。其卓有政绩、或以死勤事，及原入《名宦》者，则为传详注之。无所建白者，仅录姓名。其分驻市镇，即古者羁縻控制之术，例必著述。惟前代固不得悞用后代职衔，后代亦不得袭用前代名号，其府、州、县，直书今名。尤不可仍用前代郡名、地名，盖于理无取，而于事复有碍者也。

学校为选士之本，故凡《学额》、《学田》，例当载为典籍，而《书院》、《义学》，亦古昔党庠乡校之义，均宜备书。

《武备志》，分别营伍，详列将弁、兵马之目。凡邮亭、急递、民壮额设，即次第列之，所以严兵卫也。至团练一法，犹存古人寓兵于农之义，尚其讲明切究之。

《选举》所以储人才也。其出而上不负吾君，下不负所学，及以身殉国者，传以纪之。余则详其科目，仅列姓

氏。

前代人物，不分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循吏》，随所表见，其品目均可考而知也。惟史传原列《儒林》等类者，仍旧注之。《隐逸》必懿行足式闾里。《列女》必大节足光史册。择其尤异者传记之。次则类叙之，其近代忠、孝、节、义，事溯已往，亦必就舆论所推许，无取一家之私说。小德细行，不必悉录。若现存者，行虽可述，例不入编。惟武功崛起行间，据事直书，不拘此格。他若《谪宦》、《流寓》、《艺术》，则取其有可传者著之。《仙释》事多傅会，别为《杂传》记之。

《艺文志》始于班固，盖本刘向《七略》，纪其篇目而已。后世著作，盖棺论定之后，其有裨于世教、学业、经济者，亦可记其卷帙，或序文一篇。其余勒诸《金石》者，附见各条之下，不入此志。

《春秋》记异不记祥。刘向《五行传》，亦祇条灾异上之，盖欲人主之恐惧修省也。甘露、黄龙之瑞，贻讥后世，宜于此鉴择焉。

渠江万川寇宗谨识。

道光《重庆府志》9卷 王梦庚修、寇宗纂，道光二十三年刻本。

寇宗，字万川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授荣昌教谕，转成都教授。精堪輿术，言多奇中，著有《天学》、《易学》、《寒症》等书行世。

清咸丰三年(1853年)重修《简州志·凡例》

简州旧志,残缺已久。其作者姓氏,概不可考。至乾隆五十八年,荷溪杨氏,始采辑成书,锓版行世。然草草竣事,其中舛午实多。今不揣固陋,重为厘正,以清眉目。

旧志所已载者,标以旧志。旧志所引之旧志,则以前志别之。所纂者,标以续、增二字,以免鱼目之混。

职官,自汉代以迄前明,见诸史、集、碑、铭、记、序者,得百余人。杨志所载,仅二十余人而已。今即其确有可征者,标明来历,悉为补入。至简雍旧载为简州守,殊附会无稽,因辨于职官下,以正其讹。

所引地志,必期信而有征,自二十二史外,如《元和(郡县图)志》、《(太平)寰宇志(记)》之类是也。其余小说家言,不敢掇摭,至人物、艺文,则杂取说部,以广见闻。

政迹及选举中,或注其人事迹、行谊一二,不复更为立传。乾隆时傅尔泰《延平府志》,亦用此例,兹从之。

节孝原以励风俗,兹志所收较多,然必其年例相符,采访确实者,始敢编入。

学校、典礼,载诸《通志》,可无庸赘。然无力之家,购之者寡,兹因旧志所已载者仍载之,较为详核,盖以资学

人之稽考耳。

凡所征引,皆著名各条下,其云某书者,直录原文,一字不更者也。其云见某书者,于原文小有点窜者也。盖原文不必全属州事,摘抄数语,又或意义不明,不得不以己意櫟括其词耳。

州中先达,著述日稀,其吉光片羽之仅存者,有得必录,如刘巨济,刘后溪之流是也。其他郡县人所作有关州事者,亦具录焉,从旧例也。然所录诗文,多从诸家说部文集中采入。纵非绝调,亦无庸音。至于桥碑、庙记,其词不工,及近人应俗之文,其体已僭者,不敢滥及。

旧志所载诗文,其庸劣者,悉为芟去,以清编简。至前人之作,虽非绝响,而有关于州之人与事者,仍为编入,不敢任意弃置。

艺文不关州事者不录。其为州中名人,著作鲜见,虽不关州事,亦偶录一二。仿升庵用程篁墩《新安文献志》例。若著作已多,无庸尽录,如刘后溪所撰《赵丞相墓志》等类是也。

近人著作,虽有关州事,而其人尚存者不录,惧嫌也。

艺文除论、疏、记、序外,其体不备,难以分类,惟以年代次之。至诗得古今体若干首,以类分之,类分之中,

亦以时代相次,仿《文选》例也。

州人汪柳桥所纂《简记》,体例精而未成帙,兹志采取颇多,而注明各条下,不敢没其长也。至胡绩溪旧本,采集繁杂,然取其长而略其短,亦可谓有功志乘者。

开局后,州人士各繙阅书史,搜求古迹,汇钞成帙送局者,皆有心志乘者也。应记名采访之列。

志乘每于类分前,冠以小序,明作某志,此虽龙门式,亦习气相沿,兹仿《巴县志》例,从朴也。

兹志所载事迹,较旧志增入者十之六七,然鲜见寡闻,所知有几?兼之藏书未富,不足以资考据,其舛午遗漏者,谅不少矣。倘博雅君子,起而厘正之,增补之,庶几其为完璧乎!

清同治三年(1864年)重修《嘉定府志·凡例》

《嘉定府志》自宋梅生太守修纂,迄今六十余年,遗闻佚事,渐犹湮沉。兹编博稽旧帙,参以采访,庶可补前志之缺文,为千秋之征信。

志有以文胜者,如乾道、新安是也。有以简胜者,如武功、朝邑是也。是编斟酌繁简,尚为适中,故卷目多寡,悉仍其旧。

宋子京修《新唐书》,以为事增于前,文省于旧。兹编义取纂述,不加删削,凡宋志原文,全行刊录,其续纂者,另以“增”字别之,非敢贪多,但期完备。

宋志考核虽精,间有意见参差,未可为定论者,偶有一知半解,窃附于后,以“按”字低三格别之。

宋志艺文,最为繁富,本欲删削,因不肯没前人搜罗之苦心,是以备存。唯现在所取,不得不从严,凡有关地方

风化政教之文,始行收入;如寻常吟咏,概置不录,以省卷帙。

志中所载行谊,略仿国史之例;但国史善恶兼收,志则有美无刺,故有名位显贵,而不得立传者;若一人之身,瑕瑜不掩,则节取之,未敢任为爱憎,致失公论。

名宦乡贤崇祀,必在身后;若其人现存,例不立传,此盖棺论定之义也。唯贞女节妇,年例相符者,无论旌与未旌,不分存没,俱著于篇。

宋志有应例门,前值军书络绎,报效情殷,几几乎门无白身,若概行收入,楮墨难罄,择而取之,又失于偏,故宁割爱不录。

宋志不立武功,或附见于兵制边防,近遭蓝李之乱,虽经两次击退,未能一一律肃清,故亦不立武功,而别为记序载于文艺门中,以备观览。

此次修志，本未立局，所需经费，均系府县捐廉，其采访事迹，则责成各属广文绅耆。嗣因遭匪蹂躏，捐资不

足，不得不量为变通，以期成事。

是役之兴，时更四载，事经三任，兵燹之余，不无挂漏，识者谅之。

清同治二年(1863年)增修《酉阳直隶州总志·凡例》

修志者，必以旧志为底本。州属旧志，已刻者则有邵牧合修之志，与张令之黔志，陶令之彭志。未刻者，则酉、秀、彭亦各有抄稿二本，今即据之为主而增其所未采，补其所不及，赢于旧者，不啻十之九焉。非取求胜于前人，祇以补苴其罅漏而已。

邵《志》分14门，陶《志》分10门，张志分30门。张令事各为志，类于《通志》之体，陶、邵颇觉简贵。然以《户口》附《田赋》，以《名宦》附《官师》，以《物产》附《食货》，以《选举》、《乡贤》附《人物》得矣。至《星野》附于《建革》、《寇盗》、《灾祥》附于《风俗》，不几不论不类乎！今既事增于前，则亦文繁于旧。各列为志，使弗混淆，譬之《儒林》、《文苑》，不妨异传。而书《理学》、《道学》，各自分门以纪。前人修史之成例，即今日作志之先河也。

是书于正史，则考之《史记》、前、后《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、《晋书》、《宋书》、《齐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北周书》、《隋书》，新、旧《唐书》，新、旧《五代史》，《宋史》、《金史》、《辽史》、《元史》、《明史》。于杂史，则证之《华阳国志》、《十国春

秋》、《路史》、《南疆逸史》、《通鑑纲目》、与《元和郡(国)[县]图志》、《太平寰宇记》、《元一统志》、《明一统志》，国朝《一统舆图志》、《广輿记》、《读史方輿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乾隆府、厅、州、县志，四川新、旧《通志》等书。凡有引证，皆标书名，非敢自诩因通，以见地无荒僻，莫不纪载有征，在作者之留心考核耳。

府、州、县志，每于纂订新志后，将旧志原序列入艺文。夫序以序作志之由，即笔手高华，殊于古文不类。今并编于卷首，而以原序别之。一以见前人创述之苦心，一以明后代继承之所自也。

志重图绘，闾郡总图而外，次以《州县全图》、又次以城池、官署，次山川、水利、次名胜、次古迹、次学官、书院，次钟鼎乐器，皆当有图以备观览。州属所志，或有图，或无图，或仅有一二图。今又适无绘手，故所图只略具规模，设色布置，是有望于后之能者。

历朝上谕，有人之《艺文志》者，云章天藻，原不难超轶马、班。但天语煌煌，而以臣下之辞，比类连书，未免失

于不谨。今仿照《通志》体例，国朝上谕，恭录卷首，而明代勅谕，即附其后。至于御制诗文，现在颁行直省者，既已家弦而户诵，亦不敢妄附于简端，所以唯敬畏之心，而不敢僭《通志》之体也。

志地者，以《星野》为先。然星野之说，言人人殊，殊难凭信。今考其地势，参证群书，为并陈并鬼翼轸诸星，以待达者而是正焉。

志莫重于沿革，沿革不清，则名称淆混，邵《志》以今之酉阳为汉之酉阳。《涪州志》以晋永和以后之涪陵，为汉及晋初之涪陵，与《元和志》之以唐黔州地为酉阳地。《广舆记》之以酉阳宣抚司为秦之黔中者。同一牵混。兹为引证群书，拆衷确凿，其邵《志》、陶《志》之欠于分析者，亦即随条附辨。务使历朝建置，皆不以影响滋疑。

《疆域》一门，以见四封之广狭，道里之远近。征发期会，于是权缓急焉，词讼传唤，于是判迟速焉，故一并列诸书，而一以现在之道里为断。盖疆域虽无改易，而道路则有更张，四至八到，所以各为一说也。至旧《通志》载有黔、彭厅疆域，此犹改土时规制，与今之疆里无与，亦赘载。

《形胜》一门，各志率以一二语、三四语标其大概。兹编亦未能免俗，但并陈旧志，或兼采古书，不以重复为嫌，正以见《形胜》之为可据尔。至八景本非形胜，而标名既古，例亦得而附载焉。

《山川》一门，惟旧志、杂书已纪录者，则备登之，其余非甚有名者，概不之及。以州属无地不山，无山不洞，里居文士，巧构八景之名，隐退清流，自誉一乡之美。既无关于重轻，故皆夷诸自桧以下。

古志所列之山川，今有不知其地者。或称名改易，或采访未周，譬之九河沦塞，而遗踪旧迹，汉人得其三，宋人得其一。不可谓今所难指证者，后世即断无主名也。故仍缕析列之，以备参考。

志重古迹。旧县旧城，皆当详载者也。旧志于洪杜县（唐置，寻废，故志在今彭水县南一引者）增谭司，信甯县（隋置信安县，唐改信宁、宋省、故治在今彭水县西北一引者）、洋水县（唐置盈隆县，改为盈川，又改洋水，宋省，故治在今彭水县西南一引者）以及土官千户，旧书旧址，嘉禾堂、怡思堂、飞来峰、湛月亭诸胜，俱不一书。岂以为无征而不信乎？！兹从各书一一订正，补录，都濡（唐置，宋省，故治在今彭水南一引者），洪杜，虽已非复属城，亦必据史标名，以见各朝郡县之制。

《坟墓》一门，如柳敏墓，今已无考。长孙无忌墓，据《唐书》无忌自作墓昭陵莹中。上元元年（674），诏复官爵，仍准归葬。则信宁旧垆，已非寄藏体魄之乡。然旧志相承，诗歌凭悼，从未有言其返葬者。故似于《彭志》载之。其余载于旧志，与达官坟墓，亦纪

录不遗。所以存古迹于荒芜，仰前贤而慨慕也。

汉、晋碑刻，见于《隶释》与《碑目》者，蜀中为多。西属则僻处边荒，柳孝廉碑外，未尝有闻。而各书又有以为碑在忠州者，石碣无存，已不能认定其地。兹从杨升庵之说，收入黔州，庶《金石》一门，不致寥寥寡色。

《城池》、《公署》、《市镇》、《关隘》、《津梁》、《塘堰》等类，邵《志》固纪载不详，各县志亦多简略，今详查新旧案卷，加之采访。惟《津梁》、《塘堰》，尚有遗漏，然亦小桥，小堰而已。七星半月之高，百步千金之钜者，已收录无遗。

《学署》、《学官》、《学额》、《学田》旧志混同莫辨，抑或语焉不详。且有将圣庙规则，并附学校者。圣庙虽为学校而设，入之学校，终属不伦。陶、邵虽有前师，今止各从其类。至《义学》、《书院》、《考棚》、《宾兴》，州之所有或为县之所无者，亦各举其相类者以为之志。至《书院》、《宾兴》、《田土》，亦登载无遗，则以自创设，以至于今，田土之数，已半属名存实亡，故存之以待饩羊之复。《考棚》一事，尤州中巨举，当及建议始事者武生郭光华、吴德华、冉正华。左右相事者，武生陈继辙、冉瑞胡，些殫竭勤劳，克成胜美，志内虽名姓难举。然终始皆诸人之力为多，为附名于《凡例》内，读志者毋忘诸人之功可也。

《户口》，旧志所载，多据承粮花户而言，故皆附之《食货志》内，以丁与赋相因也。今惟秀、黔二邑，以粮户纪数。西、彭则按户稽查，有漏载之丁，无不登之版。

《食货》以《田赋》为重，岁有领支，则取于《田赋》者也。杂税以佐田赋之不足，故附焉。《仓储》、《蠲赈》为田赋而有事者，亦附焉。其余财货则见之《物产》，而不杂入。重农桑，急本务也。

《正祀门》内，如圣庙中礼器、乐器、乐章、仪注、此《会典》所载，部颁通行，原不必于州志中胪列，但州属僻居边境县邑，兵燹迭经，圣庙、学宫，或改造新修，或屡迁屡废。不唯宫悬未备，抑且礼器缺如，饩羊去而告朔之礼亡，此诸生之忧，而当事之责也。为缕悉志之，以俟他时之复修焉。

文、武庙之历朝崇祀，亦于州志无关，但圣庙崇祀，各书纪载颇详。文、武二圣，则考证绝少。往往楹联扁额，为腐儒以小说演义中，不经之事，凑合成文，徒形猥褻。兹按朝代而编列之。使阅志者，皆得溯沿流而生景仰。此纪载之所以不厌其详也。余如社稷神祇，先农八蜡，勾芒、雩禘、厉祭及川主、奎星真君，天后各神，与俗祀神祇，亦多详考其事始，此人庙必问之意，而亦略为都人士备考据之资也。

承平之世，不讳言兵，《武备》一门，自非可略。州属新、旧志于先朝兵

制,既采访不备,即现在改营、分汛,亦脱略不全。兹将五营改建,详细分疏,其裁拨之数与廉俸饷乾、军装、器械亦备载不遗,所以表国朝定制之周,亦即见州属藩篱之固也。至于武署,唐铺、屯田、团练、事之主于武备者,由兵制而暨及焉。

《职官志》内,如酉阳则冉守忠,冉如彪,史志明有。知州之名,彭水则自唐赵国珍,前亦有令、守等官。今邵《志》断自改土始。陶《志》断自赵国珍始。以致冉守忠等既无名,汉、晋之涪陵令、守,又为《涪州志》攫去。承讹因陋,俱有未安。今以历朝职官冠前,凡见于诸史者,大约十得其九。见于旧志者,则又十增其六。庶雄封大郡,犹可想见于设官分职之中。此志职官之微意也。惟武职自黔江千户而外,大抵皆文武兼统者,故所绝止于国朝焉。

酉阳、秀山皆土司地,自宋至国朝,传世数百余年,土官不纪,则未改土前二地,何以有《建置》、《沿革》?历史有《外夷传》,《明史》有《土官传》,此物此志也。今邵《志》概从抹煞。《秀山新志》,亦仅纪原始,皆不足语于笔削之公。为自宣抚司外,长官千户,并纪其名,且采诸史志以存其事实。使酉、秀疆土,不徒以蛮烟瘴雨滋疑。

《选举志》,旧志于前代科目,选贡、虽或遗漏,亦略有纪载。至《杂官》、《赏选》、《赠荫》、《行伍》、《军功》,有旧所未载者,亦有昔所未有者,虽无

预于选举,而同被乎恩荣。进身之有他途,致身则仍一理也,故并志之。

循良之吏,口碑在民,历传不泯,专列为传,则后之守土者,益当景前哲而懋新猷。旧志杂于《职官志》者,非入于《人物志》者,尤为不类。其忠烈,文武,身非此邦之人,亦不当于《人物志》内混列。兹编以《政绩志》统之,贱不逼贵,抑亦愚不先贤也。

忠孝者,人之大节,故《人物志》内,以忠烈,孝友为先。其割股者,毁遗体以伤亲心,国朝功令,不在旌表之列。然愚夫、愚妇,发于至性之自然,以求救其亲于死亡之地者,志乘例得而表扬之。至若奉养无缺,温清不衰,循循于子道之常者,虽有乡评,兹不具载。

高义之士,一言造福,斯之为上。让爵、让产者次之。指困焚券,又其次也。至于公义所在,捐弃金钱,盈千累百,则慷慨不吝,君子亦引重焉。惟已没者,则名各列行。现在者,则附录于后,略示差别之意,正以坚其为善之心耳。若名为施予而实事无征,或些须推解者,在子孙皆有阐扬懿美之心,在志乘必无滥下褒荣之例。

志载人物,有以《儒林》、《文学》名者,兹以贤达咳之。凡驰声仕路、蜚誉文坛者,不必更列名目,以文与行本相兼而贤,与才尤共贯也。耆寿则断自九十始。下此者不胜书,踰此者无或漏,以征盛世之人瑞焉。

《流寓》、《方外》，各志家多另列为志，或附在《列女》后。以《流寓》则异地之人，而《方外》非吾儒之学也。惟人以其类，女不先男，故仍附诸《人物志》之末。

妇女守节，似易实难，功令以守节三十年，上踰五十者，始在旌表之例，然或食贫，守志年例未符，而能忍风雨于盛年，必不致易节操于末路。与甚谨而弃之，毋宁过而存之，盖垂苦节以著壶仪，实操公评而发潜德也。

烈妇、烈女、贞女，境遇之难，性情之美，须眉所愧，鬼神所欽。此千古之礼宗，坤维之正气也。但妇而烈女，而贞与节皆事之不幸，而境之至变也。君子语常不语变，故次于节妇之后焉。

《物产》一志，陶、邵二《志》并简略。黔新《志》则多杂俚俗之名，兹编列正名于上，而以俗名注其下。分类纪录，文简物详。虽如《山谷集》之郁山柅，东坡诗之山胡鸟，旧志石邪之野猪，邑梅之白鹇，画眉、五味子，厚朴，平茶之黄蜡，楠木，土降，香樟木，以及草木鸟、兽之属，不无未经载人者。然较之旧志，则不为不多矣。若油漆、麻、楸等物，缘地土之宜，供民生之用者，则尤必详志之，用以补《食货》之遗焉。

风俗与化移易，贞淫奢俭，不可以昔概今。然以昔之恶，形今之美，亦以昔之得，见今之失。江河日下，古道难存。为上者整躬以率民，在下者奉公

而守法。则廉隅砥厉。仁让风行，词讼简于公庭，诵读闻于四境。不惟守土者之责，而亦士大夫之望也。

《艺文》一门，赢于旧志者十之八，蜀才《易》注，缘系汉《易》35家之列，故一字一句，皆哀采无遗，其余诗文，亦分门编录。惟现在名手之作，则概不登载，以避去取之嫌。

州属素称乐土，苗匪、白莲匪之乱，虽漫轶疆界，残破无多。自咸丰间，黔匪数陵酉、秀及彭，发匪复犯黔、彭及酉。其间防御、战守，经岁历时，官弁劳心，士民竭力，扫犬羊而靖燧燧，其阵亡殉难者，不可不纪。其战胜攻取者，尤不可不书也。故哀辑史志，及上官遗事，合之近事，为《武备志》焉。

遗闻轶事，有类于不经，寇乱灾祥，不可以为训者，为《杂事志》以纪之，而史志之错讹者，为《辨误门》以附其后。盖补遗、匡谬，著书之体皆然，亦望后之修志者，有以匡今日之不逮也。

州属以介在边壤。旧志四苗、四弯。曰蛮曰獠，曰彝，曰酋，皆以僻陋轻之，以今日文物声明，蒸蒸日上，方之内地，又复何殊？但吴、越、荆、楚，不以昔日之蛮夷，遂掩后来之名胜。故旧志所载，皆避而不书，不惟存载籍之旧，亦以励都人士振拔自立之心也。

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新修《潼川府志·例言》

明唐枢撰《湖州府志》，分土地、人民、政事三门。《四库提要》已闕其体例，未能精当。乾隆中，张鹤坪太守，撰《潼川府志》，仍仿其格，与《提要》之论相左。兹准班(固)《(汉)书》十《志》体裁，虽平正无奇，而前人名志，多用此法。雍正九年，河南巡抚阿思喀，续修《河南通志》，分《舆地》、《河渠》、《食货》、《学校》、《武备》、《职官》、《人物》、《艺文》八总纲，而各系以子目。嘉庆中，四川总督常明，监修《四川通志》亦如之。此外，不可枚举。窃谓标名不必苟异，牖事不必苟同。倘创立名目，侈言新异，则李元度《上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例书》及《平江县志·凡例》，已引《四库提要》之言，详驳之矣。

天文之学，近时不乏专家，然郑子产之言曰：“天道远，人事〔道〕迩，非所及也。”（《左传》昭公十八年，前524年一引者注）博物君子尤难之，况执管窥之见者乎？谨绎《四库提要》江南星野辨原案云：星土之说，虽本《周礼》保章氏，亦见《左传》诸占，然先儒已不得其传，解多附会，术家用以推验偶应者，十不得一，不应者，十恒逾九。况疆域既非古而犹执二十八宿，尺尺寸寸而度之，其乖迕殆不待辨。輿国所列，大抵具文，博引繁称，徒为枝赘而已。所

论如是，可谓漆室巨幽中，授以□龙之烛矣。钦定《热河志》，删星野一门，识见超越千古。康海《武功县志》、段玉载《富顺县志》名作也，皆存天文而不论，识者黉之，况旧志已列，是编更可从略。

沿革为地志要领，自应稽考精确，然如刘宋《州郡志》载“遂宁太守，永初郡国有。何无。徐云：旧立，领县四，巴兴令、徐《志》不注置立。疑是李氏所立。德阳令，前汉无，后汉，晋《太康地志》属广汉。广汉令，汉旧县属广汉。宁蜀郡复有此县，未知孰是”云云。刘宋去汉晋未远，说已疑似，轳轳如此。沈约修《史》按即《宋书》，犹不能折衷一是，而谓士生千载后，能凿凿言之，丝丝不爽，诂可信乎？兹谨录《大清一统志·潼川府属沿革表》，及《四川通志·沿革说》，冠诸篇首，以免纷歧。

南宋刘甲《古今人物志·序》，唐以前凡称梓潼者，而今之隆庆（宋隆庆府，以剑州普安郡改置。元改剑州，即今之四川剑阁县治——引者注）。称涪者，即今之绵州（今绵阳市）。惟称郪及广汉县，乃潼川（今三台）也。是编，凡涉唐以前梓潼、涪县职官、人物，概不列载。又如梁魏间王足攻涪城，

邢峦上表言,涪城宜取,潼州刺史杨乾运降魏等事,皆在绵州,亦不阑入,以杜混淆。

方志家多立建置专门,而以城池、公署、坛庙之属归之,兹悉并于舆地类,以省纷繁。

山川分上下篇,仿谭吉璠《延绥镇志》,段玉裁《富顺县志》例也。好山无数,但载其有名者。蜀水三大宗,涪江居一,其源与来会各水,详齐召南《水道提纲》,惟文太繁重,不如《皇朝通考》,所载之精括。敬录冠川部篇首,以为总纲,至各县入涪之水,与山溪涧谷之水仍分县胪列,庶几展卷了然。

古迹可资考订,方志家所不废也。杜注《左传》,郦注《水经》,多引故城故亭,而荒邱废冢,亦详见焉。兹悉附《舆地志》。

陆氏隄其《灵寿志》例,凡浮屠老子之宫,屏而不书,此因儒者之卓识。然唐宋以来,相沿已久,骤难芟薙。且此中多名人,金石文字,汰而弃之,殊可惜也。兹附《舆地志》。

《周官·小行人》适四方,集礼仪为一书,借以验政治之得失,此为方志家志风俗之祖。潼俗见于《通志》者,简略见于各县志者,公共慈专采遗俗而有书可据者较雅,附《舆地志》。

《洪范》八政先食货,《周礼·职方》,辨九州山泽之利,并及男女生数,鸟、兽、穀种。史家志《食货》,肇自班氏。隋有《诸郡土俗物产书》,此方志

家著录财赋物产之祖。惟他志多立田赋专门,兹统于食货,而以户口、仓储、盐法、茶法、物产次之,系《通志》例。

康海《武功(县志)·田赋志》曰:宏治以上不论,论今所赋者。兹就光绪十五年所修《潼川府赋役全书》,撮载大要,以前者不载,亦《武功志》例。

潼属盐务,为蜀中一大纲。光绪间丁文诚公撰《四川盐法志》,不能家有其书,兹撷其涉潼川者,曰沿革,曰配引、曰榷额、一一备载,庶使留心磋商者,一览而知。

潼川茶课,《通志》与各县志,颇有参差,兹就各县现行者查载,较近而可征。

物产,非此地特有者,不一一胪列,亦《武功(县)志》例也。兹所采撷,皆实是潼川所产。而又有古书据者外,此悉略而不载。

学校为风教所从出,宜郑重特书,宋朱长文《吴郡图经》,周淙《乾道临安志》,常棠《潞水志》,元袁桷《延祐四明志》,皆立学校专门。康海《武功(县)志》为简括计,并学校于建置。方志家多讥之。兹仍专立《学校志》,而以文庙冠首,书院次之,试院,学额又次之,学田附末,亦潼属近年建置之一端也。

祠祀、典礼为天下所通行者,详旧《府志》及各县志,兹不赘载。

李氏元度撰《平江县志》,以文庙归入《学校志》,而以祠祀另列一条,所以示一尊也。兹从其例,而又参用《通

志》之法，以祠庙归入《輿地志》，轻重较为得宜。

《艺文志》例，肇自班《(汉)书》，《隋书》始改为《经籍志》，《旧唐书》因之，《新唐书》又改为《艺文志》，《宋史》因之，明焦竑修《国史》辑《经籍志》，《明史》又改为《艺文志》，要之，同是载书目，卷数，及撰述人姓名，不分《经籍》、《艺文》为二事，标置两题也。是编既仿史书立《经籍志》，即不别立艺文专门，免床床屋屋之弊。

《经籍志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仍仿各史，不涉评陟，与陈氏《(直斋)书录解题》，《四库提要》体例小别。《隋志》例，撰书人，特书官爵，是编所载，不尽有官爵者，故止书名、书地，前人则标朝代，国朝人止书名，系《书目问答》例。

艺文，不立专门，散著于各条下，楮墨既省，眉目亦清，此范成大《吴郡志》例也。康海《武功(县)志》，嘉庆《四川通志》，段玉裁《富顺(县)志》皆仿之，兹从其例。如无地、无事可附丽者，弃又可惜，别为补遗，入《杂志》。

金石之学，郑(樵)氏列诸《通志》，考古所资，断难遗漏。兹择其有可附丽，而文全者，仍散著于各条下，文残缺而无可附丽，或只有碑目无文者，均归《金石》类。

金石艺文，有雅丽而旧志未载者补之，有鄙俚而旧志已载者削之，有阐扬忠烈，政教所关者补之，有留连风

月，意味全无者削之。卷帙浩繁，唐以下文字，尚须决择去留，元明以降，非名人及大有关系者，更不能尽录矣。

潼属，自唐宋以来，名贤流寓，题咏篇章，本集彰彰可考，各志或误记时、地、朝代、人名，或臆造题目，或以古人之作，误为近作，遂致坊刻类书，沿《郡县志》之讹者，不一而足，兹一一辨正之。

生存人诗文，无论不尽佳，即佳亦不可遽采入志。何逊并世之才，萧(统)《(文)选》不录其一字，正以其为生存人也。今仿此例。

武备乃近日要务，而以团练为尤急。李氏元度撰《平江县志》，《武备》一门，于团练始末，叙述特详。兹于潼属《兵制》、《驿递》，一一胪载外，并列总督鹿(传霖)，近年《练丁新章》，亦犹李氏详团练之意也。

潼属为蜀北门户，自东汉初迄于国朝咸丰间，不少兵事，兹搜罗史册各书，仿《延绥镇志》、《遵义府志》体，立《纪事志》一门，以备稽览。惟每事标题，改编年为纪事本末，与《延绥》、《遵义志》小别。

《后汉书》以下，皆有《百官志》，既方志家《职官志》所由昉也。《周官》御史，掌在位名数先后之次。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，唐人《厅壁记》，皆职官题名之所由昉也。梁元帝《丹阳尹传》，贺氏《会稽太守赞》，唐人《成都幕府记》，即《名宦志》之所由昉也。《灵寿

志》例名宦即于职官中，胪列事实，不立专门。今分《题名》、《宦绩》、《忠节》三门不另立名宦条目，通志有《杂传》，即仿欧阳(修)《(新)五代史》例，以寓褒贬之意，兹可从省。

《选举志》，肇自《唐书》，《宋》《金》《元》史，皆仍其例。唐重进士科，明增举人一科，国朝因之，士人舍此，无以为进身之阶。其途既隘，其进益难。故方志家，仿《登科记》《题名碑》遗意编次，科第之先后，一一胪载简端，所以示异也。累代以来，甲科绳绳，已有积薪之叹。至现今，途辙不一，职衔荐辟，尤为书不胜书，县志既已列名，是编祇可从略。

《(新)唐书》志《艺文》，有江敞《陈留人物志》，阳休之《幽州人物志》，方志家纪人物，权輿于此。此即史家列传之意也。见于《隋书·经籍志》者，有吴阳胜《桂阳先贤画赞》，晋张方《楚国先贤传赞》，见于《遂初堂书目》者，有《岳阳名贤传》，常璩《华阳国志》，亦以《先贤士女》、《后贤志》分篇。潼属自汉以来，名人辈出，流风遗韵，焜耀史书。兹编分目，仿《常志》例，自汉至明人物曰先贤，国朝人物曰后贤，次曰孝友、曰忠节、曰行谊、曰列女，曰隐逸，曰耆寿，而以《流寓》附焉。

前代人物，史册有本传者全录，近人则祇能仿《武功(县)志》例，撮载大节，总括生平。《职官传》，则摘其涉潼川者录之。

自来记地理者，或于神仙荒怪，遥续《山海(经)》，或于洞天梵宇，揄扬仙佛。齐召南《水道提纲·自序》已讥之。是编《人物志》中，不列仙释事迹，有可存者，附入《杂志》。

《元史·孝友传》，仿《新唐书》体，骈叙人名，而以事迹，卓卓可称述者，提列于后。”《明史·孝义传》仿之。张坝《扶风县志》，叙列女亦仿之。潼属人物，以忠节、孝友著者，列女以节孝、贞烈著者，林立薪积，可谓盛矣。事迹已详县志，祇合仿各史体裁，尽数骈列姓氏，有本传及阐物文字，提行另列。

生存人，即行谊卓绝，亦不轻列志中，所以杜索米立传之嫌也。况盖棺而后论定，夫岂易易乎！

小说九百，本自虞初。后之为目录学者，悉不废杂家。兹故摭摭各书，凡涉潼川琐文逸事，足以资考证，广异闻，供吟咏者，悉著于篇，统名之曰《杂志》云。

郑氏《通志》，亦纪详异，方志家多祖之。李氏元度撰《平江志》谓《祥异》一条，去之则事实无征，归并则无门可隶，特仿正史立《五行志》，体格未免宏大，况潼属祥异，历史中有载者，有不载者，难立专门，兹悉归入《杂志》。

构造虚景，系以恶诗，大是志书滥派。明杨慎云：天下安得有许多景耶？“国朝谭吉璠云：吾见《三辅黄图》、《风土记》诸书多矣、未尝有所云景致者也。景致之目俗甚，又往往作诗以标

置之,何与?《四库提要》云:“志必有景,景必有人咏,景诗必七律,最为恶习。”是编概不列载。

陶宗仪《辍耕录》云:凡书官衔,俱当从实,否则久远莫考。“顾炎武《日知录》云:“以今日之地为不古,而借古地名。以今日之官为不古,而借古官名,皆文人自盖其俚浅也。”明王鏊撰《姑苏志》,杨循吉曰:府志修于我朝,当以苏州名,不应标吴王台名。国朝林本裕撰《盛京志》,标名曰:《辽载》。《四库提要》云:《留都记载》而标名仍题前代之称,于体例终为乖迕,合而观之,则志书标题,不得用古地名,古官名明矣。是编悉从各家之说。

考古征今,皆非易事。书籍不备,耳目难周。筹款维艰,动形掣肘。兹第见闻所及,次第排纂成书。有未详

备,留俟后之来者增补。

《乾隆府志》行,而旧州志,湮没无传,究不知其书何如,论者惜之。兹新志虽成,仍然不废旧志,所以存前人之苦心,而待后贤之鉴别,不相沿袭,亦不相菲薄也。

文人相轻,从古皆然。然《新唐书》成,而《新唐书纠谬》出矣。《(新)五代史》成,而《(新)五代史纂误》出矣。《纂误补》又出矣。刘知几《史通》,于历史皆有贬词,况方志之小焉者乎?吾曹生古人后,而责其上下数千年事,网罗无遗,端居一室,而责其周遭二千里外事,丝毫不舛,能乎?将不自信矣。是编第恃载籍为考据,凡足迹未经者,自揣访误必多,博惟君子,如能指摘更正,幸甚!幸甚!!

清光绪新修《潼川府志》30卷,阿麟修,王龙勋、王世芬、刘光谟等纂,光绪二十三年(1897)刻本。

阿麟(生卒年不详),字子祥,辽宁铁岭人(满洲正黄旗汉军)。清光绪二十年(1894)由户部农曹出任四川潼川府知府。光绪二十一年倡重修府志,次年聘邦人士王龙勋、王世芬等开修,仅经年而志成。

王龙勋(1849~1912)字汝言,号鲁畲,四川三台县星日乡人。光绪丙子科(1876)乡试举人,捐戴光禄寺署正衔。工诗文,多著述,主讲潼川府学草堂书院十年,门下多名士。著有《志学掌录》、《笔谈》、《读诗随笔》、《日记》、《诗经讲义》、《宋元学案约钞》等诗文集多种。

王世芬(1855~1936),字润苍,四川三台县奎木乡(今三元乡)人。光绪戊子科(1888)乡试举人,授天全州训导、潼川府教授。清宣统元年(1909)出任四川谘议局三台县议员。毕生致力于乡梓教育,以乡贤出任三台县桂林书院、聚奎书屋山长,晚年曾任潼属联立高中国文教习,门下亦多英才。多题记,有《培修桂林书

院记》、《聚奎书屋记》、《甘霞洞记》、《流杯池记》等传世。

刘光谟(1846~1916),字文卿,射洪人,光绪元年(1875)岁贡生第一名,入尊经书院学习十年,后任斋长。光绪九年(1883)应约修《射洪县志》,著有《射洪县修志议》,当事者伎之,视等匏瓜。光绪二十三年,襄纂《潼川府志》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《涪乘启新·编纂大意》

近代地志通例,多分文、质、政三纲,所区条目尤繁。是书仅就一州邑论,例为少变,然亦颇采其义。惟文、质咸入《地理门》,政之别为风俗一门,而纳人物于中。编既成,适奉京师大学堂编书局所颁《乡土志例目》,核与兹编,详略小有出入,而大体契合,故仍之。

《奏定学堂章程》所列《初等小学堂学科》:于历史则讲乡上大端故事,及本地古先名人事实;于地理则讲乡土、道里、建置,及本地先贤祠庙遗迹;于格致则讲乡土动、植、矿各物。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,使知其作用及名称。是编各门,即本此为准的。耳目所习,一经指示,便成学问,以启初学之知识,无逾于此。

州志体例疏舛,久为大雅所嗤。輿图尤粗劣不足观。此编仅冠总图于首,余从阙如。又户口、盐法、粮赋、征收等类,岁历既久,时有更变,一切以近今为准。而旧志有足备考者,亦未概略,以期今昔情形,一视了然。

西政、西学之有神中国,近无智愚

咸知,取外辅中,虽在圣者莫外,是书略仿此意,而宗旨和平,因时、因地立言,不敢过高,致苦徒言难行。

是书稍异于州志,如叙邮政,则云有待推广。叙砦洞则以为不足恃。又志修于同治中,学田时尚未兴,学堂改章,科举已废。又目前学校变更之大,诸如此类,咸为补入,以见今古异宜,因时为要。

是书风俗,多主实业立论,盖中国事事蹈虚,为祸最烈,欲州人之痛除此病。而淫祀异端,亦吾国数千年巨毒,迄今害尤未艾。经正民兴,斯无邪慝,摧陷而廓清,故言之特详。财政一端,于地方衰旺,国家强弱,有绝大关系。故是书于致贫致富之原因,必三致意。其间如农、商、工业,种植、矿产,凡有关兴利事宜,无不反复阐发,期于国计民生有神。

地球各国,兵械日新,战争日烈。必激发国民志气,使各有尚武精神,具军民资格,始足转弱为强,自立于不败。是书于武备之张弛,民气之衰盛,暨前人武功遗迹,目前兵事大端,未肯

忽略,其义窃取之顾氏《(读史)方輿纪要》一书。

州中交涉之事本少,是编于政治门必列交涉。风俗中又就教会言之。凡有关于外族情事,各门各条,无不略为叙述。并欲观此书者,生国家思想,明种族界畔。所关远钜,不得不详为

透发。

是书所言政治风俗,多就目前立言。人事迁变数十年后,百废具举,情势自必不侔。尚冀留心民物之士,时为更正!典等学识溷陋,成书仓卒,纰缪尤多。大雅君子,赐之纠绳,则更幸甚!

清光绪《涪乘启新》3卷,一名《涪州小学乡土地理》。贺守典、熊鸿谟编,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刻本。

贺守典(生卒年不详),涪陵(今重庆市涪州区)人,同盟会员,与熊鸿谟合编《涪乘启新》。凡分3卷38目。

熊鸿谟(1884~1945),字伟成,涪陵人,清末拔贡,川东师范学堂肄业。民国时期,历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议员、米易县知事、涪陵团练局长及南川、秀山县征收局长等职。